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文革”书写

奚志英

(盐城工学院 人文学院, 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新移民作家严歌苓的创作对“文革”有着持续集中的关注。在她的“文革”题材小说中,成人世界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被暴露无遗。而当这些阴暗面投射到孩子身上时,也留下了扭曲变形的投影。不过,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所及并不是纯然的丑恶,她又总是努力去寻找人情的温暖和善良的怀抱,让读者在感受黑暗与残酷时有一些温暖的慰藉。由于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感”,加上移民生活给予她的视角和思考的拓展与深化,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有意减少了对斗争、苦难的血淋淋的揭露,而把重点放在了对人性的展示和分析上。

关键词:严歌苓;文革;人性

中图分类号:I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0)04-0042-05

新移民作家严歌苓以对普遍人性体验的关注在美国华文文学中独树一帜。她出国后写的作品主要有两类题材:移民和“文革”。目前,对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外题材作品上,而她的“文革”题材小说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作品群。从《天浴》(1996年)、长篇小说《人寰》(1998年)、中篇小说《白蛇》(1999年)、短篇小说集《穗子物语》(2005年结集出版),再到长篇《第九个寡妇》(2006年)和《一个女人的史诗》(2006年)的出版,可以看出,严歌苓对“文革”进行了持久的关注和思考。作为一个有移民身份和丰富“文革”记忆的作家,严歌苓的“文革”小说从叙事风格到小说内容上都与大陆主流作家对“文革”的叙事有明显区别,呈现出丰富的色彩。

一、对人性的深度拷问

1. 荒诞、丑陋的成人世界

严歌苓对“文革”题材的爱好,一是因为“文革”伴随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代,那十年是心灵最为敏感、躁动的成长期,成年后的她自然对这一记忆有着特殊的情感;二是因为“文革”和移民一样,都是戏剧性的生活。而戏剧性的环境最有利于展现人性的阴暗面。她说:“谁都弄不清楚自己的人格中容纳了多少未知的素质——秘密的素

质,不到特定环境它不会苏醒,一跃而现于人的行为表层。正因为人在非常环境中会有层出不穷的意外行为,而所有行为都折射出人格最深处不可看透的秘密,我们才需要小说……于是,我又总是寻找这个‘特定’,以给我的人物充分的表演空间。”^{[1]161}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成人平时不会展现出的互相伤害、攻击、背叛、摧残美丽……等人格缺陷都在这个反常的社会里爆发了。

《白蛇》中,著名的女舞蹈家孙丽坤在“文革”时遭到了非人的待遇。革命群众以集体的名义,无端强制禁闭她;为了给她扣上“间谍”的罪名,对她无休止的进行批斗,要她一遍又一遍地交代她和捷克舞蹈家的“腐化”过程;为了“检验”她是否和假特派员徐群山(舞迷徐群珊的化名)有不正当关系,竟然运用暴力强制对她进行妇科检查……自然,反映“文革”中艺术家受迫害的命运,并不是新题材。但严歌苓又向前进了一步:她不仅写了孙丽坤的被迫害,还写出了她在迫害之下重新自我塑造的过程。后者比前者更为残酷。在集体无意识下,本来美丽动人的孙丽坤变得庸俗不堪,变得没了羞耻之心。“他们没想到两年牢监关下来,一个如仙如梦的女子会变得对自己的自尊和廉耻如此慷慨无畏。”^{[2]6}她把别人对她的迫害转成了自我迫害和自我监禁。这也是她对别

收稿日期:2010-08-30

作者简介:奚志英(1979-),女,江苏江阴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人的报复方式。可能对她来说,在一个不懂得欣赏美的人面前,在一个不允许美的集体面前,是不需要美丽、高雅的。这里,严歌苓冷静地展示了人们对于美的复杂心理和极端态度。“美,要么引发敬畏,要么引发疯狂。”^[3]

在文革这个打倒一切、颠覆一切的年代,人们的道德自律失控了,对于自身无法企及的东西,他们不能容忍。于是,人们无所节制地释放着个人内心本来被压抑着的权力欲、窥视欲、破坏欲,对一切美好的东西加以破坏、践踏和毁灭。肮脏、来路不明的女叫花萍子(《梨花疫》),遭到了整条梨花街人的鄙视与唾弃,只有粗俗不堪、酗酒成性的于老头真心对待她。于是两人之间产生了相濡以沫、惺惺相惜的爱情。爱情的滋长改变了他们:原本整日醉眼朦胧的于老头又开始写山东快书了,而萍子也褪去了污秽的外表,肌肤变得珠圆玉润。这样美好的爱情故事是让人颇感温馨的。但很快地,萍子就被人告密当作麻风病人被抓走了。同样,《角儿朱依锦》也是写美的被毁。在穗子眼中,一代名角朱依锦是“全世界第一仙女”,连走路都像在舞着水袖。但文革来了,朱依锦不能在舞台上展示她的美,只能被革命小将戴高帽批斗。当她自尽未遂被送到医院后,受到了更多的集体凌辱。在病床上,她一丝不挂地成为了“示众”的材料。“朱阿姨是一只白蝴蝶标本,没死就给钉在了这里,谁想怎么看就怎么看。她不防护自己,在你眼前展览她慢慢死掉的过程。”^[4]

《人寰》中,父亲和贺叔叔之间的友谊和合作,有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在反右运动中,贺叔叔的职权保护了“我”的父亲,使“我”全家在他提供的政治和生活保障下苟且偷生了下来。父亲出于感恩,主动提出替贺叔叔写一部长篇小说。为此,他付出了整整四年的心血。长达百万字的小说成书后,署名只有贺叔叔一人。父亲四年的生命痕迹就这样被轻轻地抹杀了。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父亲可能会一直这样匿名地、不满而又不懈地写下去,但“文革”给了他一个改变这种关系的契机:贺叔叔被打倒,成了人人批判的目标。父亲压抑在心头多年的委屈终于找到了发泄口,他做了一件不可原谅的蠢事:冲上台去当众打了贺叔叔一记耳光。这一下,暴露出了父亲人性中的阴暗面。对于父亲对“恩人”贺叔叔的反戈一击,年幼的“我”对他们的行为无法做出是非善恶的判断,及至长大成人、历尽沧桑后才

对父亲的“造反”有了全面而透彻的理解,那是源于人性中一种软弱、害怕被孤立的恐惧及寻求安全感的心理:“不投身到集体的恐怖中去,是没有安全感的,退化最终是寻求安全感。把别人致伤、致死,只不过是为我了一点安全感。突然跳起来,掴人一个耳光,仅仅是图那点安全感。红旗的海洋里,沉浮的原来都是些不安全的心。”^[5]因此,在《人寰》中,父亲这样的知识分子,不仅是受害者而且也是施虐者。小说真实地展现了知识分子人性中的卑劣,更贴近历史真实。在国内80年代诸多“文革小说”中,知识分子一直被描述为一群受尽折磨的“受害者”形象,而忽视了他们作为人在特殊历史情境中的人性反映。而《人寰》在反映“文革”荒诞社会现实的同时,更注重挖掘人在面临利益选择的时候,能否保持一种人格的独立和尊严。

2. 纯真与荒唐交织的儿童世界

在文革这个荒诞的年代,成人世界的种种深远、神秘的因子被激发出来,暴露无疑。而当这些阴暗面折射到一个孩子身上时,或者深深地镌刻在了孩子年幼的心灵中,又会是什么模样呢?在《穗子物语》这部短篇小说集中,严歌苓通过穗子这个孩童的视角,来表现大时代中成人世界对孩子的影响。敏感、聪慧、早熟的穗子,虽然明白老外公对自己的疼爱,但又觉得外公的蛮横匪气、不体面、以及佩戴的假勋章最让她面子难堪、无地自容(《老人鱼》);自诩为城里人的优越感引发了穗子的嫉妒心,她偷了从乡下来的柳腊姐的私房钱(《柳腊姐》);在萍子被带走时,穗子趁着混乱揪了一下萍子的头发,以验证人们对麻风病者“头发像是种在沙土上的青葱,轻轻一拔就是一把”的道听途说(《梨花疫》);穗子还和“拖鞋大队”的女孩子们一块儿背叛耿获,商量怎样才能揭开耿获的真实性别(《拖鞋大队》);她们还偷窥小顾,抖出她的私生活(《小顾艳情》)……“面对人心向善的社会和时代,她和她年幼的伙伴们以恶报恶,以恶报善。”^[6]成人世界在孩童身上留下的是扭曲变形的投影。穗子们在缺乏管教又受到大人负面刺激的日子里,生长出了蓬蓬勃勃的恶毒、龌龊心理,一步步离纯真善良越来越远。

严歌苓从个体经验出发来重构关于历史的记忆。她放弃了通常所见的轰轰烈烈的文革场景来描摹乱世,而是巧妙地构筑了一个儿童世界,来与成人世界相对照。在儿童的视角中,文革的喧闹

变为一些细节化的东西,如来回跑动的黄色解放鞋、院子里不断贴上又撕掉的大字报、无法理解的自杀等。由于孩子们不谙世事,因此在观察和感受世界的时候,注意到的往往是生活的细节。儿童认识世界大多是体验世界,这种体验是感性的、碎片的、不连续的,不像成人那样中规中矩,具有严密的逻辑。因此,他们在认识世界时,一般不是依靠成人的理性思维,求得对历史的合乎逻辑的认识,而是依据自己的一种独特的直觉感悟,作生活细节和客观事物的最显在表象的叙述展现。但也正因为非成人视角的细节化表述,却往往更能够还原生活的本来,甚至更能凸显生活的真实性,产生更为震撼人心的审美效果。

同时,在叙事视角的选择上,作者又为穗子设置了二重身份,一是身处历史情境中的穗子,一个是成年后反观这一切的穗子。“童年的穗子”和“成年后的穗子”双重视角的交叉,使得严歌苓一方面可以自由地出入于儿童记忆与故国经验,另一方面又因为时空的距离而获得一种类似“局外人”的观察角度,从而对“文革”采取一种更为理性的审视态度,让小说具有了普遍意义上的人性关怀。比如,在《拖鞋大队》中,穗子们的父亲被打为“反动诗人”、“反革命文豪”、“右派画家”,在农村接受改造。在端午节那天,女孩们费尽心机弄了不少“精致物件”去看望父亲们。可是,葱葱爸为了表示自己改造的决心,主动交出了女儿的一片心意,导致她们的父亲要集体悔罪自己“生活作风糜烂,把资产阶级的奢侈品带进了劳动改造的艰苦环境”^[7]。这一行为折射出他们思想被改造的彻底程度和立功邀宠的心态。作者在此写道:“看来她们的父亲被改造得相当好,不但善于叛卖别人,更善于叛卖自己。”^[7]这种后来者站出来的一番议论包涵了作者无限的愤恨和无奈。寇寇父亲的背叛,直接导致了女儿的背叛。为了回到“拖鞋大队”这个集体,葱葱背叛了耿获,跟拖鞋大队成员团结一致,把耿获围堵在厕所里,以检验耿获的真实性别。在厕所里扒下耿获裤子的场景是小说中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当成年后的穗子读到信中女孩们对耿获的行为时,她“闭上了眼睛”,不忍去看这疯狂和残酷的一幕。在这里,叙事者的成年视角与儿童视角交织在一起,两个穗子不断交叠,让小说变得令人揪心。正如作者所说的那样:“当童年的我犯错误时,我在画面外干着急,想提醒她,纠正她,作为过来人,告诉

她那样会招致伤害,而我却无法和她沟通,干涉她,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把一件荒唐事越做越荒唐。”^[6]两个穗子视角的交织,不但折射出当时社会的道德破败,也显示出个体在时代悲剧面前的无能为力。这样的叙事策略,使得严歌苓可以更好地发挥她作为女性写作者的感性思维,也使得她的小说在具备一种洞穿人性真实的深刻当中,依然不失一分明丽和轻快的叙述笔调。

二、对温暖人情的追寻

严歌苓在诸多有关文革记忆的叙事文本中,反复演绎着美的被戕毁这一主题。她甚至还向我们展示:达到了极致的美,在被破坏、被毁灭时,只有走向死亡与寂灭才是必归之路。她说:“我不将‘死’乱施于人。我认为此人物美得不能再美,必须用‘死’才能把这美推向一个其他方式无法达到的高潮,让我自己的情感在此趋向饱和,我才舍得赋予他(她)‘死’的奇异光环。”^[8]对她来说,至美的人格只有用她最高贵的一笔——死——才能来完成。因此,在《白蝶标本》中,当年幼的穗子竭尽全力也保护不了朱依锦的尊严时,严歌苓安排了一个和穗子一样真诚崇拜朱依锦的人——门房韦志远,到医院拔掉了朱依锦身上的管子,结束了她“白蝶标本”般的生命。

同样,《天浴》中牧马人老金的存在,也跟韦志远一样,“给了我们这个时代可以救赎的力量”^[9],使得这么黑暗、丑陋的故事稍微能让人忍受些。女知青文秀被下放到一个人迹罕至的牧场,日渐被人遗忘。没有权势、没有关系、没有金钱的她为了回城,只能运用自己唯一的资本——把身体献给农场领导——以换取回成都的机会。那些摸黑进文秀帐篷的男人,不管是牧区供销员,还是场部领导们,利用手中的权势,在一次次地占有文秀身体之后,却从未给她半点温暖和希望。在文秀一次次沉沦的过程中,终于意识到回城的无望。也许对她来说,只有死才是回家的唯一道路。小说的结尾,严歌苓安排文秀主动要求老金给她一枪结束生命,这样的自杀原本是故事悲剧性集中的场面。可是,严歌苓却不动声色地把它描写得很美:

文秀站直,正面迎着枪口。

忽然地,她请老金等一等,她去编结那根散掉的辫子。她眼一直看着老金,像在照相。她淡然

她再次笑了。

他顿时明白了。从她的举动和神色中,他明白了她永诀的超然。他突然明白了她要做什么。

老金把枪端在肩上。枪口渐渐抬起。她一动不动,完全像在照相。

枪响了。文秀轻飘飘地倒下去,嘴里是女人最满足时刻的呢喃。老金在搁下枪的同时,心里清楚得很,他决不用补第二枪^{[2]58}。

作者简化了文秀死时的残酷过程,镜头紧接着就是文秀轻飘飘的倒地动作。随后老金把她抱进水池里,文秀“合着眼,身体在浓白的水雾中像寺庙壁画中的仙子。”^{[2]58}在文秀最无助和绝望的时候,只有“不齐全”的老金守护在她身边,默默地爱护她。最后,随着又一声枪响,老金抱着文秀完成了一次“天浴”,此时的老金是“齐全”的。这里,严歌苓用简洁的语言勾画出了一幅诗意的场景。这种诗意的言说,给《天浴》中的“文革”控诉增添了一份暖意,让我们在感受黑暗与残酷时有了一些温暖的慰藉。可见,严歌苓的“文革”书写所及并不是纯然的丑恶,她总是努力去寻找人情的温暖和善良的怀抱,从中显示出作家的悲悯情怀。

三、严歌苓“文革”书写的特质

童年时期所见识到的人的种种不可理解的荒诞的言行,引起的是成年后对这些刻骨铭心的童年记忆的深刻思考。不过成年后的严歌苓以在美国留学所受到的文化教育和异域的生活经历,来回望过去,当然也多少带有了“他者”的眼光来重新认识曾经的生活。她说:“‘文革’是我人生观、世界观形成的最重要的阶段。很多年后回想很多人的行为仍然是谜,即使出国,我也一直没有停止这种追问,人为什么在那十年会有如此反常的行为?出国以后,有了国外生活的对比,对人性有了新的认识,再后来接触心理学、人类行为学,很多事情会往那方面联想,会把善恶的界限看的更宽泛些。”^{[10]260-261}因此,在严歌苓的“文革”书写中,她有意减少了对斗争、苦难的血淋淋的揭露,而把重点放在对人性的展示和分析上。这一点,正是她与新时期“伤痕文学”的不同之处。十年“文革”,带给祖国和人民的灾难和伤痕是那么深刻,因此“文革”一结束,从“四人帮”专制主义桎梏下解放出来的人民,怀着强烈的激愤立即投入到了披露“四人帮”罪行的运动中,“伤痕文学”应运而

生。多数“伤痕”小说的叙述焦点在于揭露和控诉“四人帮”在“文革”时期所犯下的罪行,控诉他们对革命干部、知识分子以及各界人士的迫害和愚弄。如《献身》(卢一民)、《大墙下的红玉兰》(葛翎)、《我是谁?》(韦弥、孟文起)等作品侧重的是老一辈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遭遇;《班主任》(谢惠敏、宋宝琦)、《伤痕》(王晓华)、《铺花的歧路》(白慧)等侧重的是青年在文革中遭遇的生活突变、爱情悲剧和精神伤痕。这些作品大多停留在对社会与人生伤痕的表层描写上,其情感基调是愤怒的、激情的。而严歌苓对文革“血泪史”是持反感态度的:

中国人喜欢用“血泪史”来形容此类历史(如移民史,笔者加),或者“血泪斑斑”等词汇。经过“文化大革命”,我对这类词汇不以为然,大概“文革”中各种控诉、各种失真和煽情的腔调已让我听怕了。我觉得“血泪史”之类的词里含有的庸俗和滥情,是我想回避的。我觉得越是控诉得声泪俱下,事后越会忘却得快,忘却得干净。因为情绪铺张的宣泄之后,感官舒服之后,是很少有理性升华的。而缺乏理性认识的历史,再“血泪斑斑”也不会使自己民族及其他民族引以为证,引以为诫^{[1]149-150}。

如今与“文革”有了更长时间的距离,人们已经变得更加理智,情绪逐渐冷静,对“文革”的思考和认识也越发清晰和深刻。尤其是严歌苓这样的移民作家,更是因为有了移民的经历而具有了一种特殊的审视目光和近乎局外人的情绪基调。这种目光并不仅仅是经历了岁月沉淀、拉开时间距离后的一种回忆或怀旧,更重要的是它的着眼点在一个崭新的异质平台上。这样的平台更有利于作家走出原先的框架,把“文革”只是当作一个乱世背景,重点在于表现人们在这个背景下出现的各种反常行为和心里。就像她自己所说的:“移民也是最怀旧的人,怀旧使故国发生的一切往事,无论多狰狞,都显出一种奇特的情感价值。它使政治理想的斗争,无论多血腥,都成为遥远的一种氛围,一种特定环境,有时荒诞,有时却很唯美。移民特定的存在改变了他和祖国的历史和现实的关系,少了些对政治的功罪追究,多了些对人性这现象的了解。”^[11]因此,严歌苓对“文革”的书写并没有刻意去描摹那个时代的背景,也没有受难者和迫害者之间直接的血淋淋的批斗场景出现。

“文革”的记忆对于她而言,就是那些人性张力下产生的扭曲和痛苦,使人产生广泛的怜悯和同情。

同时,我们也应看到,中西方文化的双重背景固然为严歌苓获得了一种“边缘的目光”,来对“文革”进行审视、沉思与理性的批判,但这种双重文化背景也使得她直接面对两类或更多类的读者,在满足这些读者的阅读期待时,难免有失衡之处。如何在反思政治、审视政治中的个人和人性本相的同时,又不过分的展露“异国情调”色彩,这就需要作为知识分子的努力和责任感。毕竟,跨文化叙事作品由于读者“接受屏幕”和“期待视

野”等的变化,在跨文化语境下作家的叙事也会随着异文化读者对象的不同进行调整。在西方读者眼中,一个来自中国大陆的当代作家多少应该懂点“文革”,这是一种“期盼视野”。而对于从“文革”中成长起来的作家严歌苓来说,“文革”又是她们这一代作家极具切身感的生命体验,写“文革”是她们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因此,对任何一个严肃的作家来说,如何在矛盾中寻找平衡,是一种极为艰难的寻找过程。从这个角度来说,严歌苓在树立自己独特性追求的路途中,还有诸多有待改进之处。

参考文献:

- [1] 严歌苓. 波西米亚楼[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 [2] 严歌苓. 严歌苓文集·白蛇[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 [3] 李晓林. 严歌苓作品中的悲悯与荒诞[J]. 小说评论,2003(1):66-71.
- [4] 严歌苓. 严歌苓文集·谁家女初长成[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278.
- [5] 严歌苓. 严歌苓文集·人寰[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68.
- [6] 严歌苓. 穗子物语[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7] 严歌苓. 拖鞋大队[J]. 上海文学,2003(9):6-18.
- [8] 严歌苓. 一个女兵的悄悄话[M]. 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8:370.
- [9] 严歌苓. 十年一觉美国梦(演讲)[J]. 上海文学,2005(6):32-35.
- [10] 孙小宁,严歌苓. 我到河南种麦子[M]//庄园. 女作家严歌苓研究.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2006:260-261.
- [11] 严歌苓. 呆下来,活下去(创作谈)[J]. 北京文学,2002(11):55-56.

On the Writing About Culture Revolution in Yangeling's Novels

XI Zhi-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51, China)

Abstract: New emigrant writer Yangeling continued to focus on the Culture Revolution in her works. In those novels themed as Culture Revolution of hers, some secrets in the deepest space of adults' world that can not be penetrated have been exposed completely. While this dark side projects onto kids, twisted projection left. However, the writings about Culture Revolution of Yangeling were not all ugly. She used to try to find human warmth and good embrace, which provided a bit of warm comfort feeling between darkness and cruelty. Because of distance of space and time, plus the expansion and deepening of her special view and think offered by emigrant life, Yangeling deliberately reduced those bloody disclosure of fighting and suffering in her writings about Culture Revolution, yet she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how and analysis on humanity.

Keywords: Yangeling; Culture Revolution; humanity

(责任编辑:李开玲;校对:李 军)